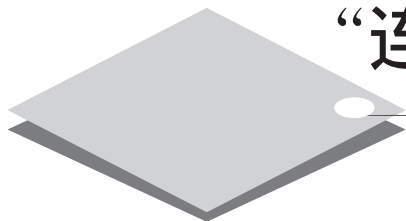


海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 “连续整体论”述评



□ 王东红

〔摘要〕新近的论著显示，“连续整体论”是海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讨论中的主流观点，但不同学者在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上就此各有侧重。即存有差异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有明显的共通之处；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是在曲折的前一时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个历史时期皆有得失而未来中国发展仍任重道远。国内学界应坚定历史自信，在交流中使引领国外相关当代中国研究成为“新常态”。

〔关键词〕海外中国研究；前后 30 年；连续整体论；历史自信

季塔连科在 2013 年第 2 期《远东问题》上发文指出，中国近代革新者在儒学的影响下都强调从历史中学习而注重传承，所谓“温故而知新”，然而面临的却是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将传承和创新结合起来也是中共领导者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和责任使命。的确，延续和变动（连续和变革，continuity and change）是海外中国研究的一对关键范畴或重要主题。这也体现在持续至今的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以下简称“前后 30 年”）关系的讨论中。如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第 56 至 59 届大会共通论题就分别是“文革 40 年与中国的现在”（2006 年）、“重新审视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的再认识”（2007 年）、“1978 年时代划期说的再探讨”（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60 年——中国完成了什么？走向哪里？”（2009 年）。在此，根据新近出版的著作和论文集等，仅对海外前后 30 年关系研究中较为主流的“连续整体论”加以述评。

一、前后 30 年虽有差异，但共通点占主导

尽管前后 30 年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和工作重心、领导人的思维风格和领导方式、具体政策和实际工作等方面有差异，但两个时代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领导人及其体制下的历史，都是谋求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

包弼德（Peter K. Bol）说：“不可以把中国的历史割裂开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古代跟近代、近代跟现代，以及古代跟现代，是有着逻辑的连贯性和继承性的。”香港学者叶国华在《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

1842—2049》中指出，“中国模式”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过去 60 年奋斗、30 年改革密不可分，但其成功也得益于晚清、民国的变革和台湾、香港的经验。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则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是一个生命的机体，“前 30 年中国国际关系相对封闭；后 30 年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对

- ① [俄]米·季塔连科：《季塔连科论中国社会主义现象》，李燕、康晏如编译，《国外社会科学》2014 年第 5 期。
- ② 整理自日本现代中国学会全国学术大会网页（<http://www.genchugakkai.com/zenkoku.html>）。
- ③ 相关研究参见王东红：《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 30 年关系研究述评》，《北京党史》2013 年第 4 期。国外介绍中国 2007 至 2013 年有关前后 30 年关系讨论的文章，参见 Joseph Fewsmith，“Mao’s Shadow”，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43, Spring 2014。以中译文网站和报纸为来源介绍国外对于新中国 60 年积极评价的文章，参见沈传亮、苑晓杰：《国外学者评析新中国六十年》，《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6 期。较早的相关论述参见成龙：《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9—245 页；文晓明、杨建新：《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概述》，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4—154 页。上述研究中所引文献本文不再赘述。
- ④ [美]包弼德：《在细微处观察中国历史》，张冠梓主编：《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75 页。
- ⑤ Kwok-wah Yip, The Uniqueness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1842–2049,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2, p. 1.

西方社会开放了,经济也得到了持续发展”,主张在讨论其历史断层的同时,也应讨论历史的持续性,而正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两个不同的时期联结在一起。恩里克·凡胡尔(Enrique Fanjul)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深深扎根于国家传统而具有延续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能被肤浅地理解为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彻底决裂”,而是一种儒家文化与列宁主义的融合,“为社会服务的政治体制应该是其保持持续性的关键原因之一”,与其说中国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不如说是一场重建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革命,同时,“30年来的改革进程与政治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不能抛开对政治领导人所起作用的理解来看待中国的演变过程。政治领导人的地位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齐慕实(Timothy Cheek)则更强调“毛泽东的革命”的长久影响;毛泽东时代的诸多遗产被后毛泽东时代所继承和发展,“这两个30年从本质上而言不过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式的不同探索,并且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密切交织,是不能任意加以分割的”,“毛主义”在单位制度、户口制度等制度方面,在尊重知识分子、提升素质、政治问题道德化等态度层面,以及学理与政治层面上,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整风运动”形式的党的教育、统一战线、反对官僚主义、重视农村与农民问题等遗产仍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有俄罗斯人士认为,中国领导层始终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提高党管理社会和抵制西方冲击的能力,“中国在政策上的连续性得到高度评价。这种连续性证明了中国领导层的高度一致和政府在国内国际市场行情不佳情况下的应对能力。引人注目的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目标始终是把国家变成在世界上有威望和影响的繁荣富强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再次肩负起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的责任,这无疑是一大新要素……中国领导层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团结在更新后的国家发展学说的周围……中国的政治体系经历了四代中共领导人,日益完善和进步,但其传承性却一直未变”。季塔连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伟大历程表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把这60年的历史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探索和创造的进程。60年的时间使中国完成了一个发展的周期,并开始向新的发展阶段过渡”;“中国积累了建国60年的经验,特别是这30年来,积累了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中国的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积极性,对于实现国家的整体发展和现代化有着巨大的国际意义,对于俄罗斯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在2011年进一步指出:“在总结中国1949—1979年

社会主义建设30年的初步经验以及后来深化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实践经验,并经历了世界社会主义危机和经济全球化逐步深入的进程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整套新的理论和论断体系,这些理论和论断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代理论的创造性贡献,而且在本质上已经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代理论的重新理解,是对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再认识,已经不同于苏联、一大批东欧国家和蒙古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理论的升华。”天儿慧说:中国总是打着上任领导人的旗号,实现现任领导人的路线,是一个继承与超越的过程。如邓小平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实现邓小平路线。中国近来所强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富强的国家”、“具有民主文明的政治大国”、“祖国的统一”、“受尊敬,有责任的大国”等四层含义。要落实这些任务,就得实行“后邓小平路线”,即脱离经济优先主义走向共同富裕,由领导主义政治转向领导层内部的民主主义和非领导层的疑似民主主义,从爱国主义、大国主义走向国际化国家。一些人还通过个人的经历说明新中国的渐进变迁,如让·皮埃尔·莱曼认为,像他一样的西方人眼里,中国形象从贫穷、成为西方攻击目标、世界中右翼政治中心、令人惊叹的转型、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等的60年变迁,始终与中国的文化、政治思潮、经济水平密

[美]柯伟林:《应完整地看待新中国的历史》,《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260页。

[西班牙]恩里克·凡胡尔:《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参考消息》2011年2月14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参考消息》2011年10月25日。

[加]齐慕实、张明:《毛泽东与毛泽东研究的当代境遇及其展望——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齐慕实教授访谈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俄]叶列娜·波多利科:《中国发展模式:“和谐重于财神”》,《中国模式:海外看中国崛起》,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俄]季塔连科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国际意义和中国改革的经验》,周红译,丁明编校,《当代中国史》2009年第6期;《前进中的中国——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及展望21世纪中国发展前景》,李瑞琴译,《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伟大的胜利伟大的变革——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杨进译,《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5期。

[日]天儿慧著,范力译:《日本人眼里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13页。

切相关。

学者们对于各领导集体先后执政的后 30 年的连续性也进行了探讨。库恩指出,外国观察家往往强调或夸大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差异乃至政治斗争。如认为胡锦涛在思想和政策上与江泽民发生了断裂,甚至表现出是邓小平理论的降格,因为他的前两任强调经济增长。事实上,经历了高速发展的中国,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四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而有了独立的国家,邓小平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江泽民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和振兴发展,而胡锦涛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重整优化了中国发展。正如一位高层领导人的“修路”类比,邓小平之前没有路,人们也没想到他们需要路;邓小平改变了人们对路的想法而掘出一条泥路;江泽民接着将其铺成了公路,尽管仍有人一开始不相信这条路的正确用途;胡锦涛则把路变为了高速路,并使通行的车辆降低了污染。而就第三代领导集体和“胡温新政”,蓝普顿(David Lampton)说:“我们不应该夸大两届政府之间的差异,因为其中一些反映了不同的领导风格,而另一些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烙印”,比如“胡温”在内陆的长期经历使得他们对地区发展和人民收入的不均有深刻体悟,政策则就折射这种生活背景;在对外关系上的不同侧重,则与现实国际格局的变化有关。事实上,“胡温”时代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总体稳定与前任的努力密不可分,第三代领导集体为后续发展提供了基础,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就日益重视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收入不均问题,1999 年还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习近平则更为自信和强势,所提出的“中国梦”也较之前的指导思想更为平民主义和通俗易懂,同时,其为巩固政权还发起了反腐败运动和“毛主义”的“群众路线”运动。

二、前 30 年曲折中奠基,后 30 年继承中发展

前 30 年在曲折中为后 30 年及其之后的中国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后 30 年是对前 30 年的纠正、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彼得·诺兰指出,中国共产党善于古为今用,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强调忧患意识、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毛泽东时期留下了诸多有价值的遗产,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很多方面是很吸引人的,但是也造成了严重后果,付出了很大代价。对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进行了总结。中国不能再走回头路,而只能走出“左”与“右”等的十字路口,以实践、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摸索前进而走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古巴学者认为,新中国 60 年在

20 世纪后半叶和 21 世纪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经济发展看,“毛泽东时代出现了一些偏差,但为 1978 年之后大力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便利条件”。30 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虽存在诸多问题,但“在脱离西方和开辟另类国际共存模式的同时,中国开辟了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的西方模式的新选择”。马丁·雅克强调,共产党第一阶段执政的成就,“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恢复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获得的经济腾飞,尽管有灾难性的破坏,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德里克认为,革命所寻求的社会转型虽然并不完美,但其具有社会主义的目标,强调独立自主的发展,带来了使国家团结和统一起来的一场组织转型,造就了一种政治和劳作的新文化,为 1978 年之后的良好运行奠定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基础,同时,部分成就也是发展新方向上必须进一步变革的障碍,改革时期便利用了这些成就并扫除了其中的障碍。

具体而言,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在比较分析中得出,前后 30 年都存在制度承继(institutional continu-

Jean-Pierre Lehmann, “China in My Life — Exploring China’s Future”, *The Globalist*, Feb. 11–16, 2008. 中文版收录为《从“贫困中国”到“富裕中国”——一个法国人眼中的中国 60 年变迁》更恰当,参见袁殿池编选:《海外望神州: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7–111 页。

Robert Lawrence Kuhn,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Reform and What This Means for the Future*, Singapore: John Wiley & Sons, 2011, pp.121–123.

[美]孔博:《对中国新领导集体的几个“想不到”——美国学者的观察与评估》,《第一财经日报》2004 年 12 月 31 日。

Zheng Yongnian, Lance L. P. Gore eds., *China Entering the Xi Jinping Er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1–2.

Peter Nolan,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pp.109–110.

[古巴]胡利奥·A·迪亚斯·巴斯克斯:《新中国 60 年孕育新模式》,《中国模式: 海外看中国崛起》,凤凰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8 页。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London: Penguin Press, 2009, p.99.

Arif Dirlik, “The Idea of a ‘Chinese Model’: A Critical Discussion”,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 No. 2, June 2011.

ity), 中国的增长不仅仅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 事实上赶超式发展始于 1949 年, 不同于 20 世纪 80 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单纯自由化, 中国在 1979 年市场改革时, 促进其成功的强大制度体系和人力资本已在毛时代准备就绪了。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说:“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等政策, 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 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 而奥尔森认为, 相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经济表现很差, 但从长期的结果看, 正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彻底击碎了行业、企业或行政管理人员等组成的“分利集团”和凝固的制度, 经邓小平等“实用主义者”接着挫败毛的遗孀和“四人帮”成员后, 内部人员的游说活动已无法破坏市场导向的改革, 随之而来的是个人责任的市场制度, 其后果是快速的经济增长。 戴维·施韦卡特也认为, 前 30 年使得中国形成了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利于改革的阶级结构, 即不存在阻碍或破坏土地改革的地主阶级和地位巩固的地方资产阶级, 有自己的资源和市场而无与跨国公司浸透挂钩的强大经济阶级, 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集体工业、多种所有制顺利发展, 得到鼓励的形成中的企业家则更有益于社会, 后 30 年就利用和贯彻了“毛主义”时代为了人民的利益所取得的成就。 乔万尼·阿里吉则用大量数据表明, 中国的经济成功基于毛泽东时代的非凡社会成就, 这尤其表现在成人人均寿命和扫盲率等人口基本福利指标方面, 即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在改革开放前就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克里斯·布拉莫尔还论及灌溉项目、杂交水稻种植等来说明毛时代农业成就对改革时代经济的基础作用。 石家安讲到, 共产党在中国的前 30 年执政中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教训。 这包括意识形态和经济的结合会带来爆炸性的后果; 应将技术和经济活动与官僚机构分开; 在某些选择出来的地区集中基础设施和专家仍然是有必要的; 中国政权的命运与中国的经济繁荣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也在尝试和失败中不断学习。 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格利埃塔等认为, 中国是一个具有帝国延续性的中央集权国家, 2000 多年间王权一直持续长存。 中国共产党也从中获得启示而力图使政治体系得以绝对控制, 并保持社会稳定和给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如 1950 至 1978 年的社会主义时期, 对于理解后续政治经济改革及其 80 年代第一阶段的成功至关重要。 特别是强大的中央政治经济规划和资源的高度集中, 促进了劳动力的动员、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并对此加以详细论证。 不过, 黄焜季等与国外学者合

写的著述则提出,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政策占主导地位, 虽然对提高粮食产量和食品安全作出了贡献, 但是令人失望的农业并未真正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而促进国家工业化。 于是, 在改革开放之初, 因农业改革的低成本和即使改革失败也不会对城市和工业部门产生重要影响, 便从农业的生产组织、价格体系和市场机制入手, 将农业作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 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科技和市场化改革, 使得农业大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未来农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

三、前后 30 年各有得失, 后续仍待不断完善

前后 30 年都有成就和弊病, 在人权进步、社会治理、国际责任等方面仍需长足努力。

Vladimir Popov, *Mixed Fortun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Russia, and the West*,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79-90.

[印度]阿马蒂亚·森著, 任贇、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260 页。

Mancur Olson,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p. 166-167.

David Schweickart, “You Can’t Get There from Here: Reflections on the ‘Beijing Consensus’”,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a Model or Beijing Consensus for Development”,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August 8, 2005, <http://www.luc.edu/faculty/dschwei/beijingconsensus.pdf>, pp. 16-18.

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7, pp. 370-371.

Chris Bramall,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253-256.

Oded Shenkar, *The Chinese Century: The Rising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Your Job*,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2005, pp. 33-34.

Michel Aglietta, Guo Bai, *La voie chinoise: capitalisme et empire*, Paris: Odile Jacob, 2012, pp. 17-18; Michel Aglietta, Guo Bai, *China’s Development: Capitalism and Empi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6-7.

Jikun Huang, Keijiro Otsuka, Scott Rozelle, “Agriculture in China’s Development Past Disappointments, Recent Success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in Loren Brandt and Thomas G.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467-505.

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近现代以来不多见、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次会议,中国当代社会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化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特别表现在人口从一个高生育率、低寿命社会转型为低生育率、高寿命社会;经济发展上劳动力从低产出的农业、初级产业流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体制上从计划转向市场;社会心理从个人服从集体、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到个人权益意识兴起。与改革开放前相比,30年来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但不能老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还不够清晰,目的还不够清楚,同时,要让老百姓参与讨论和决策,才能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在和衷共济中实现国家发展的新目标。另外,中国出现了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缺点恶性结合、叠加呈现的情况,要防止不愿改革的局面。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政府治理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复杂,更具流动性和活力,传统的列宁式体制的基本边界已被打破,垂直和水平的相互影响和整合在地方政府表现尤为突出;中国政府强调试验,毛泽东时代的村办企业、特定区域引进外资也是如此,这是中国政府决策的一个传统。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认为,前后30年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如外出用餐的频率)、中国国际化(民众对世界了解程度)、社会流动性特别是地域流动性(在外工作和旅游的机会)等方面,而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影响塑造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深刻变迁。但变化最小的政治领域有无突破性的改革举措,仍是关系改革开放成败的大问题。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关系重大,正在进行的民众抗议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是中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代都不例外。在这方面,安源工人协会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为两个时代提供了范例,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源头。即通过草根组织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为工人谋福利,这或许是中国革命传统的核心。

还有学者从更具体的领域对此加以论述。如就前后30年中国的法治建设,李本(Benjamin L. Liebman)说,后30年里,法律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民众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改革在调整个体行为的同时开始控制政府行为,试验也是法制改革的重要元素,法律职业化得以加强。但亦有尊重司法机构的权威与大众主义的矛盾、法律发展的不平衡、司法机构享有广泛的裁量权等挑战。作为中美关系见证人的孔杰荣(Jerome A. Cohen)也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国际地位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当前中国法治建设还不平衡,如律师的独立性不够,农村法律人才不足,经济法律领域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政法系统透明度不够等。寇健文(Chien-wen Kou)

从政治继承角度指出,1978年以前,毛泽东与刘少奇、毛泽东与林彪、华国锋与“四人帮”、邓小平与华国锋之间有数次激烈权力冲突。改革开放后,随着干部制度与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权力转移机制逐步建立,虽然在80年代末也出现了高层权力更迭的危机,但90年代中期以后,魅力权力的重要性降低,而可转移的职务权力的重要性增加,干部退休、集体领导等深化了权力转移的制度化。不过未来在“最高领导人的年龄限制或任期限制”、“如何选择新任领导人”、“如何定位新旧任领导人的权力关系”上仍有需要克服的瓶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也认为,中国高层精英政治派系主义(1949至2002年)朝向更制度化形式的转变是中共韧性威权主义的主因。

四、前后30年研究复杂多元,国内学界需历史自信

海外有关前后30年关系的讨论除“连续整体论”外,还形成了“对立否定论”、“一概否定论”等观点。可以说,这些兼具政治性与学术性的观点由来已久、原因复杂、多元多样、影响深远。

前后30年的研究在不同的时段、国家、语种、机构、学者中有不同的切入点和侧重点。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至今,关于中共和中国社会如何对待毛泽东遗产就成为认识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指标。彭真在1979年恢复工作后不久就说:“我们在宣传中,必须十分慎重,决不能给国外敌对势力提供反华的弹药。国外敌对势力正在疯狂地希望我们‘非毛化’,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是极端仇视的,正在千方百计地贬低它,

[美]托尼·赛奇:《转型的中国与中国的转型》,《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页。

[美]裴宜理:《社会变迁与体制建构》,《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14页。

[美]李本:《法律改革的两难:职业主义与大众主义》,《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195页。

[美]柯恩:《中美关系与我的中国法研究》,《哈佛看中国——政治与历史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225、213-214、217页。

[中国台湾]寇健文:《从权力继承看中共党史》,《中国研究的多元思考》,(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73-103页。

[美]黎安友著,何大明译:《从极权统治到韧性威权:中国政治变迁之路》,(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3-59页。

妄图把它搞臭。” 仅以 2009 年为例召开的有关前后 30 年关系讨论的学术会议看,其涉及内容非常广泛,观点差异大。如 5 月 1 至 3 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围绕中国“政治”、“社会转型”、“财富与福利”、“文化、信仰与实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去看其未来”等议题,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国际评估”国际学术研讨会;7 月 13 日,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 60 年:全球与本土的互动”会议,围绕中国前 30 年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和政治挂帅,后 30 年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探讨了 60 年来外交政策、国内政治、央地关系、宏观经济、对外贸易、金融银行业、知识产权、军事、能源安全、公共卫生事业、少数民族群体等在与日俱增的世界影响下的变化,及其中国改革尝试所带来的独特全球意义。9 月 2 日,日本经济新闻社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东京联合主办了“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研讨会”;9 月 25 日,韩国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现代中国学会等联合主办了“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研讨会”;10 月 5 至 6 日,台湾政治大学举办了“中共建政六十年之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10 月 17 至 18 日,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和学会创立 60 周年召开会议,后收录涵盖新中国 60 年思想、政治、文学、经济、社会等发展的 12 篇论文,以《新中国 60 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为题出版;10 月 21 至 23 日,俄罗斯科学院等联合举办了第 18 届“中国、中华文明与世界:历史、当代与未来”国际研讨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和中俄(苏)建交 60 周年。

甚至由于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国外学者尚存的偏见、对中国国内研究成果关注不够、受中国社会思潮和西方媒体宣传影响较大等原因,同一个人同一本书中存在前后不一致的观点,难以归类。赛茨(Konrad Seitz)在多次再版的同一书中,似乎既有割裂前后 30 年的倾向,如指出“毛自己习惯于与第一位皇帝和国家的缔造者秦始皇比较。同秦始皇一样,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绝对权威统治下的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同他一样,为了达到目的,只要认为是必要的,毛从不畏惧权势和暴力”;“邓的中国从毛强迫人们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极权专制变成了有共产主义旗帜的东亚发展中的政体”;“不同于邓小平的是,江泽民属于美国风格的现代政治家,他借助于所有媒体来维护自己的公众舆论形象”。同时也有关于前后 30 年整体连续的论断,如“毛确实留下了一笔沉重的遗产,然而这笔遗产也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毛破除了古老的儒家文化,这样也清除了中国经济发展上的障碍”;“邓时代的后期为中国社会创造了一个罕见的融合,即西方化、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的融合”;“邓把中国从计划经济中解脱出来,

邓的后继者所面临的任务是:完成邓的改革,建设一个完满的市场经济”;“共产党强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仔细阅读起来,首先更多的是儒家的道德希望要求”。

这一讨论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以及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及其党的十八大召开、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和“两个不能否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和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等前后仍是热点。其在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国家治理风格”等话题中也时有提及,且话语意图各异。

分析海外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关系的讨论,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个 30 年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坚定历史自信,加强学术交流,构建中国话语,提高中国研究的质量和解释力,并引导海内外人士在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的过程中,更科学地观察和研究中国。如齐慕实就提出对于中国的革命及其革命的思想、理想和实践,包括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的革命运动,要采取严肃而谨慎的态度去研究,这有助于了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及其所经历的历史,并开拓 20 世纪中国和当代中国研究的问题域和方法,认识当下中国仍存在着革命印迹。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咸阳 712082)

《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6 页。

William C. Kirby. ed.,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 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Lai-Ha Chan, Gerald Chan, Fung Kwan eds., China at 60: Global-Local Interaction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11.

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编『新中国の60年—毛沢東から胡锦涛までの連続と不連続』創土社、2009年。

[德]康拉德·赛茨著,许文敏、李卡宁译:《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 年版,第 144、154、210、147、196、247、289 页。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二〇一三年一月五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1-112 页。

Timothy Cheek, “The Importance of Revolution as an Historical Topic”,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ol. 7, No. 2, 2013.